



面向“十二五”高等教育课程改革项目研究成果

# 宁波商帮文化

NINGBO SHANGBANG WENHUA

● 主编 庄丹华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面向“十二五”高等教育课程改革项目研究成果

# 宁波商帮文化

庄丹华 主编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宁波商帮文化 / 庄丹华主编.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2. 2  
ISBN 978 - 7 - 5640 - 5586 - 8

I. ①宁… II. ①庄… III. ①商业史—研究—宁波市 IV. ①F7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20012 号

---

---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 68914775 (办公室) 68944990 (批销中心) 68911084 (读者服务部)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 12.25

字 数 / 230 千字

版 次 /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1 ~ 800 册

定 价 / 35.00 元

责任校对 / 周瑞红

责任印制 / 吴皓云

---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 前 言

宁波地区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四明山山美水美，千丈岩幽壑飞瀑，松兰山金沙碧海，招宝山雄伟壮观，东钱湖湖光山色，上林湖越窑文明，阿育王寺供释迦牟尼舍利，保国寺大殿成江南奇迹，天一阁藏书楼亚洲第一……宁波人民数千年来在此繁衍生息，早有范蠡文韬武略，可治国安邦可归隐经商；唐有书法家虞世南，墨宝遗香；宋有王安石治理宁波，被列宁誉为伟大的改革家；王应麟的“三字经”哺育儿童，影响深远；王阳明创立心学；黄宗羲“工商皆本”“经世致用”，创浙东学派……宁波丰富的文化底蕴为宁波商贸业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特定的自然人文条件与特定的生产生活方式，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使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人们形成了特定的区域文化心理。宁波靠山面海的地理环境和跨海而治的行政区划，使当地形成了农业、渔业和商业三种谋生方式共存荣的经济文化格局。渔业生产需要外向强悍、恣肆汪洋的性格，农业生产要求和谐、平稳的实践理性，而商贸活动则强调心智的精明和灵活，于是在宁波，这三种文明因素逐步交叉、积淀，构成了宁波独特的文化传统。

丰厚的地域文化蕴涵和特定的文化传统促进了宁波商贸的繁荣，孕育了宁波商帮。

宁波商帮是一个商业群体，是指从明清以来以宁波地域为中心的，在外地经商的宁波籍商人及本地的宁波商人群体。就地域而言，宁波籍商人包括现在的宁波市所管辖的海曙、江东、江北、镇海、北仑、鄞州6区，奉化、余姚、慈溪3市，宁海、象山2县，以及旧宁波府管辖的定海（今舟山市）人氏。这里的“商”，不仅指流通领域的商贸经营者，还包括其他经济领域的投资者和经营者。

宁波商帮自明末清初开始形成，历经几百年的发展而不衰，特别是近代以来，宁波商帮以其强烈的创业精神与杰出的经营能力抒写了中国商业史上的百年辉煌，至今仍活跃在海内外且名闻遐迩。从严信厚、叶澄衷、朱葆三、虞洽卿、秦润卿，到包玉刚、邵逸夫、王宽诚、应昌期，等等，都是这片水土养育出来的人物，以他们为代表的宁波商帮，继承了宁波人的精明能干、审时度势、眼界开阔、诚信笃实，他们热爱家乡，报效桑梓，穷则独善其身，达能兼济天下。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宁波经济发展迅猛，又有一大批秉承了宁波商帮精神的商界人士在各行各业大展身手，书写出新的商界传奇。

宁波深厚的商贸传统也成就了宁波的商业教育。这里的学子与这片土地及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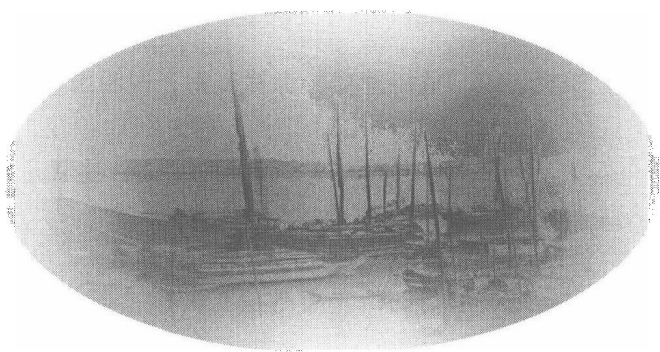
文化积淀有着天然的联系，以当地的文化资源来教育学生，具有其他教育素材所无法替代的作用。对宁波商帮现象的研究与宁波商帮文化的整理、挖掘，具有深远的意义与价值。一方面，当代甬商迫切面临转型升级，对宁波商帮现象与宁波商帮精神的研究，有助于打造新一代甬商，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另一方面，弘扬宁波商帮精神，将宁波商帮文化与高等应用教育有机结合，提升大学生职业人文素养和综合能力，也是高等应用教育教学改革的有益尝试。

编写《宁波商帮文化》，旨在阐释宁波商帮的内涵，汲取宁波商帮创业的成功经验，弘扬宁波商帮“创业、务实、诚信、协作”的精神，进一步推进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提升就业能力，拓宽就业渠道，培养更多的新一代甬商，为繁荣区域经济、建设和谐社会添砖加瓦。《宁波商帮文化》全书共列五章，深入分析了宁波商帮崛起的历史文化背景，充分挖掘宁波商帮发展演变的艰辛历程，多角度展示新旧商帮中涌现出来的典范人物及其主要人生经历，精心提炼宁波商帮的经营谋略和人文精神，同时呈现宁波商帮的百年之最和宁波在全国之最，以供学习者和研究者参考。

编者

# 目 录

第一章 宁波商帮崛起的背景 .....	1
第一节 地理环境的影响 .....	1
第二节 人文环境的影响 .....	3
第三节 外来文化的影响 .....	7
第二章 宁波商帮的发展历程 .....	11
第一节 宁波商帮的形成 .....	11
第二节 宁波商帮的发展 .....	16
第三节 宁波商帮的鼎盛 .....	19
第四节 宁波商帮在海外 .....	21
第五节 新时期宁波商帮 .....	24
第三章 宁波商帮的典范人物 .....	29
第一节 传统名商 .....	29
第二节 当代甬商 .....	68
第四章 宁波商帮的经营谋略 .....	102
第一节 创建品牌 .....	102
第二节 成功营销 .....	125
第三节 人本管理 .....	146
第五章 宁波商帮的人文精神 .....	155
第一节 开拓创新 .....	155
第二节 恪守诚信 .....	166
第三节 团结互助 .....	170
第四节 扶困济世 .....	173
附录一 宁波商帮的百年之最 .....	180
附录二 宁波在全国之最 .....	185
主要参考文献 .....	189



## 第一章

# 宁波商帮崛起的背景

人创造环境，环境也创造人。宁波作为滨海商城、浙东门户，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和陶瓷之路的起航港之一，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经营有方、深谙商贾之道的宁波商人。海路、商贸和文化贯穿了宁波发展的历史。宁波的人文地理环境，对本地域人群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有着重要影响。宁波籍著名作家巴人说过一段很精彩的话，他说：“统治宁波的是三件东西：东门外大街上商店里传出来的算盘声，各个中等学校里传出来的朗诵桐城派古文的读书声，外加半边街上那鱼行里的鱼贩的叫卖声。这三种声音就构成这中古式城市的特色。”这段话从一个侧面道出了宁波商帮文化的成因，宁波商帮就是在这样绵绵不绝的文脉与商脉中形成发展起来的，而历时悠久的对外交往史、贸易史也对宁波商帮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 第一节 地理环境的影响

任何文化的产生都离不开特定的地理环境，正如《中国文化地理概说》一书中所言：“人类文化必然产生发展于一定的空间范围，它必然要打上地理和环境因素的烙印。”宁波商帮文化的形成自不例外。宁波的地形地貌、气候水文、海陆分布情况都对其产生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 一、得地理之便，擅长航海

宁波简称“甬”，位于我国海岸线中段，浙江宁绍平原东端，即东经  $120^{\circ}55'$  ~  $122^{\circ}16'$ ，北纬  $28^{\circ}51'$  ~  $30^{\circ}33'$ 。东有舟山群岛为天然屏障，北濒杭州湾，西接绍兴市的嵊县、新昌、上虞，南临三门湾，并与台州的三门、天台相连。全市总面积 9 365 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为 1 033 平方公里。

宁波境内主要山脉有四明山和天台山两支。四明山又名句余山，是天台山脉的支脉，横跨宁波市余姚、鄞县、奉化三县（市），并与嵊县、新昌、天台三县

连接，山峦起伏，蜿蜒连绵，危崖壁立，森林茂密。四明山，据志书载：“四明山周围八百里，二百八十峰，峰峰相次，中顶五峰，状如莲花，疑近星斗，山顶极平正，有方石如窗，中通日月星辰之光，故曰四明。”这就是四明山名称的来历。天台山，主干山脉在天台县，宁波境内为其余脉，有4大分支从宁海县西北、西南入境，经象山港延至镇海、鄞县东部诸山。

宁波有漫长的海岸线，港湾曲折，岛屿星罗棋布。全市海域总面积为9758平方公里，岸线总长为1562公里，其中大陆岸线为788公里，岛屿岸线为774公里，占浙江省海岸线的三分之一。

全市共有大小岛屿531个，面积524.07平方公里。宁波境内有两湾一港，即三门湾、杭州湾、象山港。这些湾港，因有钱塘江、甬江及众多溪河注入，夹带着大量泥沙和营养物质，为滩涂和近海生物繁殖提供了丰富的养料。

任何文化的产生都离不开特定的地理环境。早在7000年前，河姆渡先民就已在这片土地上营构定居，农耕渔猎，创造了灿烂的原始文化。河姆渡遗址中曾发现独木残骸、木桨遗存和舟的模拟艺术品陶舟，以及用作制造独木舟的有段石铤。可见，当时的先民很有智慧，已发明将大木头中间挖空、放在水中不会沉下去的木船，又将细木削砍成划船用的楫，开始过水上航行生活。舟楫的发明不仅使河姆渡人得以下海捕鱼，还可以沟通原先为江河阻隔的四邻部落间的联系。1982年，在渤海湾海底发现一件侈口陶釜。这种陶釜在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及其邻近地区的史前文化中均未见到，而与河姆渡遗址发掘出来的陶釜类同。这是河姆渡人海路航行到达渤海湾的重要物证。

宁波的人文地理环境，造成甬人多有外出经商谋生的现象，一如《四明公所义冢碑》中所记“四明襟山带海，地狭民稠，乡人耕读外，多外出而营什一之利”。而独特的地理位置使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小就学会了与水、与大海打交道，这为宁波商人从事航海和海内外贸易奠定了基础。

### 二、地处海滨，经商成风

宁波地处中国中部沿海，位于东海之滨，扼南北水路要冲，兼大陆与海洋两者相结合之优势。大陆与海洋是两种完全不同但又互补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不同质才有互补性，才有贸易产生的可能。海洋区只产鱼类，不产粮食，他们必须与大陆人交易，将自己的海产品与陆地上的农产品交换。宁波的海边贸易，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宁波最东部的县称鄞县，就是因为“海人持货贸易于此”而得名的。据说，当时宁波海岸线在今天阿育王山（贸山）下的同谷，这里是陆人与海人交易最频繁的码头区。因交易频繁，经济日益发达，人口增多，政府在此设立了一个鄞县。鄞，就是贸山边上的城邑。这种交易方式，至少在秦汉时期已经产生，一直延续到整个六朝时期。这种“海人”与陆人间的贸易，本质上属国内贸易。



秦代以前，宁波商贩已为数不少。当地鄞山一带已是邻近地区农副产品和海产鱼鲜集散地，有一批商贩聚集在这里持货贸易。秦汉以后，宁波修建堰坝，开垦湖田，乡民衣食充裕。海上航路，北到辽东，南及交趾，贸易地域进一步拓展。唐宋时期，“商舶往来，物货丰衍”。元代，出现专门经营福建、广东土产的南货号 and 专门经营东北、山东、河南土产的北货号，有海运船户千余家。明代，宁波的航船，可通关东、河北、天津、山东、江苏、四川、湖南、湖北、广东、福建等地。清初，商贾聚集到宁波三江口，滨江商行林立，百货皆备。乾隆年间（1736—1795年），城区有较大店铺七百余家。宁波江夏，唐代就有市场。宋代以后，商船停泊在奉化江畔，客商云集。清嘉庆、道光年间，商船海舶停泊在三江口一带，帆樯林立高耸，蔚为壮观，与东门口、半边街、双街、钱行街、糖行街、灵桥门、东渡路共同形成繁华商业区，民间谚语称“走遍天下，不及宁波江夏”。

这时最值得注意的是“海人”群体的存在。“海人”就是海边渔民。他们开始可能也是陆地上的老百姓，但是他们敢于下海，敢于在大海中与风浪搏斗，是一群相当勇敢的人。面对大海这个没有行政边际的宽广领域，只要有利，他们就会随“鱼”而动，随利而动。《上海县续志》中称，“吾甬人以冒险之天性，斩荆披棘，经营所业，其间筚路蓝缕，艰苦卓绝。”由此可见，他们不是一群普通的农民，而是外向意识相当浓厚的“海民”。明清时期，政府实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迁海”活动，第一次是明初洪武时期（1368—1398年），为了对付倭寇；第二次是清初康熙年间（1662—1722年），用以对付台湾郑氏政权。宁波诸岛即今天的舟山群岛上的百姓，也在这个过程中，被迁移到宁波的鄞县、镇海、慈溪等地的沿海地带居住。他们身在陆地，心在海洋。这批靠海为生的百姓，随时准备下海赚钱。一旦政策允许，海禁解除，他们就会纷纷下海，寻找生存之本。这批海民的先驱行动，自然带动了陆地上的宁波人，使他们也加入到经商队伍中，从而使整个宁波地区百姓以经商著称于世。在这座滨海商城，孕育出了一代又一代经营有方、深谙商贾之道的商人。

宁波人由于生长于海滨，长期从事海外贸易，九死一生的海上生活，使他们养成了履险不惊的刚毅性格和不怕险阻的创业精神。在这种海洋文化的长期积淀之下，宁波商帮实业家擅抓时机，领先潮流，胆识过人，外出谋生，不避险远。

## 第二节 人文环境的影响

文化的产生需要特定的地理环境，同时也离不开特定的人文环境，宁波具有自身独特的人文环境，范蠡的经济思想、浙东学派的思想文化对宁波商帮影响极大。

### 一、范蠡经济思想的影响

范蠡是春秋后期的越国名臣，辅佐越王勾践卧薪尝胆，雪耻图强，经过 10

余年的努力，越国终于吞并吴国。范蠡在灭吴后，激流勇退，乘舟浮海到达齐国，定居于陶（今山东定陶县），改称鸱夷子皮，又叫陶朱公，以经商致富，被世人誉为“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这是有史可查的记录。根据民间传说，范蠡起码是到过宁波的，这以东钱湖的陶公山和陶公钓矶为证。据有的学者考证，先秦的经济思想在17世纪和18世纪曾对欧美经济思想产生过重大影响，而范蠡就是创造这些经济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

范蠡在决心“下海”的时候，曾经喟然而叹：“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国，吾欲用之家。”也就是说，范蠡打算将政治军事的谋略用于管理经济，结果“居无几何，致产千万”，“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这些都表明他的确是个出色的经营管理人才。范蠡（或者说计然）的经济思想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劝农桑，务积谷”。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加强农业，发展生产，把蛋糕做大。

二是农末兼营。中国历来以农业为本，其余各业为末。为了使农末俱兴，计然、范蠡为勾践制定了关于粮食的价格政策。他在《越绝书·卷四》中提出：“粟石二十则伤农，九十则病末。农伤则草木不辟，末病则货不出。故粟高不过八十，下不过三十，农末俱利矣。”

三是“夏则资皮、冬则资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范蠡把握天时变动的规律，提出并实践了这一生产经营思想，讲求节令，超前预测，捕捉机遇，适应市场，囤积居奇，盈利颇丰。

四是用国家调控方式来控制物价，依据市场供求判断价格的涨落。范蠡主张，在市场价格自发波动的基础上，以调节供求的办法加以调控。他认为，国家应该控制物价，把物价的波动限制在既有利于生产，又有利于流通的幅度内。如将谷价限制在一定的幅度内，就对农商均有利。实现这样合理的价格，就需要实行“平粟”政策。所谓“平粟”，即在谷价太低时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粮食；在价格过高时，又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卖粮食，凭借贱买贵卖增殖商业资本。这样，既平抑了物价利于农商，又获取巨额利润充实了国库，一举两得。美国在20世纪推行的“平价补贴”政策，与中国公元前5世纪所实行的“平粟”政策，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惊人的相似，而中国的平抑粮食价格政策比美国的早了2000多年。

范蠡的主要经济思想还有“务完物，无息币”等。“务完物”即注重商品的质量；“无息币”是注重资金的周转。以上这些经济思想，和我们现在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的确令人叹为观止。

宁波既然有以范蠡命名的地名和景点，那么他的经商故事必然对宁波商帮产生影响。如陶公山附近就出过李达三、忻礼轼等大商人。陶公山以姓忻为多，当地传说，这个忻字是人造出来的，意思是心里想着斤两，不做有违诚信之事。

## 二、浙东学派思想的影响

浙东学派，从南宋到明清，经过永嘉学派、永康学派、金华学派，从叶适，到王阳明，到黄宗羲，一脉相承，形成了一整套的经济思想和经济伦理。比如“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陈亮提出的“义利兼顾”的思想；“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叶适反对传统的“士农工商”的抑制商人的排序、“重本抑末”的传统思想，旗帜鲜明地提出“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的观点；余姚人王阳明进一步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的经济伦理；到了黄宗羲，更是明确提出了著名的“经世致用”“工商皆本”的思想。

可以说宁波由来已久的崇商、重商、善商的传统习俗与社会风气，为浙东实学提供了实践基础；而浙东学派把这种实践上升到理论，冲破了传统的桎梏，提供了新的经济思想与经济伦理，反过来又影响和促进了宁波人的商贸活动。

总而言之，宁波悠久的经商传统和深厚的经济思想是宁波商帮经营理念的基础和源头。

### （一）农末俱利，工商皆本

浙东学派是在商品经济环境中形成的，倡求真务实、经世致用。关于经济问题，他们主张通商惠工，反对重农抑商。明代中叶的著名思想家王阳明重视商业，同情商人，认为商人“终岁弃离家室，辛苦道途，以营什一之利，良亦可悯”，应当免收或抽收合理商税；还主张建设“街道市廛，俱有次第，商贾往来，渐将贸易”的“富庶之乡”。他认为士农工商“四民异业而同道”，“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皆“有益于生人之道”。“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货者”，同样可以成为圣贤，受到社会的尊重。他的大弟子王艮聚徒讲学，负贩走卒，听者云集，在宁波一带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田制》中明确主张“工商皆本”，对传统的“崇本抑末”命题给予新的诠释，认为工匠制作器物，商贾流通货物，同农业一样“盖皆本也”，只有那些不切于民用的行业才称为末。而且宁波籍学者思想较为开明，并不排斥西风东渐。鄞县人万斯同认为，西法“实可补中国所未及”。他们这些思想不仅对学术界有重大影响，对当地敬贾崇商风尚习俗的形成，也有不容忽视的潜移默化作用。

### （二）经世致用，乡俗崇商

宁波风俗崇商，乡民习惯于背井离乡，耻于安守家业。历代相沿成风，群居相习成俗，风俗是历代相沿积久而成的风尚、习俗。这是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长期相互作用，逐渐形成的社会精神现象，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和传承性。宁波乡民多谋业商界，以商为业，以商为荣，民间敬贾崇商习俗源远流长。

乡民不讳言利，奉祀财神。商家店堂设财神龛。新店开张，在财神塑像后背孔内塞进一只活蛤蟆，以牛皮纸封口，久之成为蛤蟆干，以求灵验。古人有刘海戏蟾图，商家视蟾为神物，可招财进宝，可能典出于此。商家平日对财神也虔诚

供奉。每日上供清香、净茶，朔望供素食，端午供米粽，中秋供月饼。学徒进店，要先拜财神。药铺还有一套讲究，年初进货，先购进胖大海、大连子，意为大发大利。学徒进店，先拣万金枝、金银花，意为拣取黄金、银子。也有以药名讨彩头，连翘称和合（状似），红毛大戟称大吉，茱萸称如意，贝母称元宝贝（状似），橘络称福禄，陈皮称头红，橘红称大红袍。

正月初一，店主起床，口念吉词先开门，在门口放炮仗，称开门炮。开门炮一般放三个，要“带四放三”，留一个作“备炮”，宁波话“备炮”出典于此。炮仗放得越高越响，示意新年吉利。若是“吹、吹、吹”的哑炮，则视为不祥，要马上就说：“哦，吹吹响，今年会发财。”并立即补放一个。

正月初五，为五路财神日。经商人家最重五路财神日。初五那天，商家五更即焚香燃烛，恭迎财神。供品除糕饼果品外，牲礼需全猪全羊。其实是猪头猪尾加一刀猪肉和羊头羊尾加一刀羊肉。还需公鸡、雄鹅、一对黄鱼、一对活鲤鱼。公鸡、雄鹅，意谓“鸡啼鹅叫，商店会发”。宁波人称十两重的金条为大黄鱼，供祭金黄透鲜的大黄鱼，寓“招财进宝，黄金万两”之意。用鲜活雄鲤一对献祭，祭后由两人持至江河放生，是讨“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的彩头。接财神时，店主手持三炷香，从屋外踱步摇香至店堂，示意财神已接进店内，而后依序膜拜。焚化纸元宝，火焰冲得高，视为吉利。祭神后吃财神酒，老板宴请阿大经理和职工，为商店盈利出力多者坐上横头，老板执壶为其斟酒。头道菜要上形似元宝的圆蛤，寓进元宝之意。这一天，第一个顾客登门，要奉上内泡两个金柑的元宝茶，以示开笔进元宝。正月，店主相约同行挨家宴请“新年酒”，以时新佳肴待客，加深商谊，洽谈生意。

商家还有许多禁忌。店员在店堂，禁忌伸懒腰、打呵欠，忌踏坐地袱（门槛），忌手托门枋，忌背脊朝外，说这样会挡住财神进门，生意就不来了。扫店堂，要往里扫，忌往外扫。数钱币要往里数，忌往外数，说这是“招财进宝”。在用词上也尽讨彩头，猪头称“利市头”，猪舌（与“蚀”谐音）称“赚头”。遇顾客购买结婚用品，失手敲碎东西，忌说“碎”字，而说“先开花，后结籽”。卖布，忌敲尺子。卖酒，忌摇酒瓶。走路跌跤，要马上说：“捡了个元宝。”

崇商风气所及，宁波人寒暄问候也不离商。路遇熟人，往往问：“在啥地方发财？”外出经商发迹的，谓之“出山”，反之则谓“呖出山”。民间有歌谣：“囡囡宝，依要啥人抱？我要阿爸抱，阿爸出门赚元宝！”市井街巷广泛流传着追逐钱财的谚语，如：只要铜钱多，哪怕落油锅；世上无难事，只要现铜钱；只要铜钱多，牌楼抬过河；顶臭是穷，顶香是铜；等等。

浙东学派“工商皆本”思想与当地“操奇计赢，搏什一之利”的经商传统相互交融，使宁波涌现出一批商界俊彦。尤其是上海、宁波开埠后，特别是民国时期，经商之风很盛，乡民多谋业商界。即使大学毕业或自欧美留学而归的，遇有商界高等职位，也多有弃学为之的。

### 第三节 外来文化的影响

从文化学角度看，一地的文化发展状况与该地文化交流程度密切相关。文化交流愈频繁，文化发展愈快。宁波商帮的快速发展，与其对外来文化的吸收、融合有直接的关联，在吸纳外来文化的精华的过程中，使自身得到了有益的补充和壮大。

#### 一、渡海经商，外贸频繁

在日本弥生文化后期（相当于中国东汉、三国时期），日本商人即开始驾船泛海来会稽郡贸易（时宁波属会稽郡）。据《三国志》记载，这些商人主要到会稽买布。他们到会稽，往往先驻足宁波，并同宁波商人有贸易往来。

唐时（618—907年），明州（今宁波）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外贸事业颇为兴旺。839—907年，中日往来贸易船舶37次，其中有确切记载通过明州放洋的达7次。842—865年，海商李邻德、张支信、李延孝分别率领商帮从明州望海镇（今镇海）出发，7次赴日本进行商贸活动，每次去的人数在50人左右，规模颇为可观。日本的遣唐使节、留学生及高僧等也从宁波口岸入唐。当时明州不仅有大批日本商人，还有为数不少的新罗（今朝鲜）和大食（今阿拉伯）商人。

北宋时期，明州是全国三大贸易港之一。宋淳化三年（992年），两浙路市舶司从杭州移到明州定海。咸平二年（999年），在杭州、明州各置市舶司。明州同广州、杭州的市舶司合称为“三司”，除与日本继续交往外，与朝鲜的往来显著增加，专设高丽使馆，沿途设有“航济亭”“高丽亭”，接待朝鲜的使者和商人。明州设来远驿，招待外国商人。那时明州是通往南亚、中东、非洲东海岸“陶瓷之道”的起航地，为接待阿拉伯商人，市舶司西设有波斯馆，狮子桥北建有清真寺。开赴日本、高丽（今朝鲜）的商船大都在这里放洋。日本、高丽海舶来华，也聚集在明州。1038年，陈亮等147位明州商人到高丽经商。南宋时，明州又与真里富（今柬埔寨）、占城（今越南）、婆罗（今印尼）、大食等国进行贸易往来。斯波义信在《宁波及其腹地》中说，南宋开庆元年（1259年），宁波沿海有将近8000艘航海帆船、小帆船和渔船。其中，属于鄞县人的624艘，定海（即后期镇海）人的1191艘，象山人的776艘，奉化人的1699艘，慈溪人的282艘，舟山（当时称昌国县）人的3324艘。

元代，政府十分重视海外贸易，设庆元（今宁波）市舶提举司，直隶中书省，海运户达1000余户。元代庆元与日本贸易往来极为频繁。日元之间的贸易港，在元朝是庆元，在日本是博多。所有的商船都往来于这两港之间。尽管曾发生文永、弘安之役，中日没有建立国交，可是贸易关系未曾中断过。其时，庆元与日本贸易有两种形式，一是与天龙寺船交易，另是民间私人贸易。天龙寺船是一种获得幕府保护的日本官方商船，纲司由寺院举荐，幕府任命，回国后不拘盈

亏，都得向寺院缴纳一定数额的钱币。此外，民间私人贸易十分活跃。当时日本镰仓幕府对日本商人出海不加任何限制，至元十五年（1278年）元世祖也诏諭沿海官司，令通日本商船。日本西部冒险商人的私人海舶，络绎不绝驶来庆元。元代庆元与高丽的海上贸易往来也很频繁。1976年在韩国新安海底打捞的元代中国沉船，装载着几千件龙泉窑青瓷，并有一件镌铭“庆元路”字样的铜质砣码。这些龙泉青瓷就是由温州运到庆元，然后从庆元运往高丽的。

明朝建立以后，民间倭寇的不断扰乱，使朱元璋与日本断交，关闭了浙江省舶司，加强了海禁。成祖（1403—1424年在位）继位后，与日本重新建立朝贡贸易关系，浙江省舶司重新开设。当时的中日关系，明朝无疑是主体，占据主导地位。为了明朝政府的利益，明朝单方面制定了“永乐事例”，规定了日本朝贡明朝的间隔期、人船的数量。不过，实际操作中，日本并没有遵守十年一贡的规定。明朝为了政治的需要，也只得默认了。宣德帝（1426—1435年在位）继位后，又重申了朝贡贸易的间隔期、人船的数量，史称“宣德事例”。此后，日本基本遵守了十年一贡的规定。在这个过程中，日本民间的倭寇仍不时扰乱中国。

正德末年嘉靖初年（1522年前后），宁波港情况有了较大的变化。一方面，民间贸易在兴起，福建商人开始来到宁波诸岛的双屿港筑巢。另一方面，政府间的朝贡贸易出了些问题。当时的日本处于君弱臣强时期，大权由几个诸侯控制。由于朝贡贸易有较大的利益，故而两大诸侯争着派贡船到中国。1523年，两批贡使先后到达宁波，浙江省舶司处置不当，引起内讧，史称“宁波争贡事件”。争贡事件后，明朝皇帝下令关闭了浙江省舶司。宁波正常贸易管道的堵塞，导致了走私贸易的大兴。1524年，海商将日本贡船引到了双屿港进行贸易，开双屿港国际贸易先河。不久，海商又将原在广东做生意的葡萄牙等国商人也引到了双屿港贸易。由于国际贸易高额利润的吸引，江浙一带有官员背景的势豪及无法生存的穷人纷纷加入国际贸易队伍。他们贿赂宁波地方官员及守军，取得了地方势力的保护，再加上海商武器的先进，宁波守军眼睁睁闭，双屿港贸易不断升温，规模越来越大。双屿港的兴起，是中国贸易中心北移的表现。海商规模的扩大，杀人越货行为的出现；中外贸易的不规范性，贸易纠纷的增加，为政府的出兵镇压提供了口实。1548年，朱纨下令出兵，强行捣毁了双屿港。双屿港的捣毁，表明对于明朝政府而言，国家安全利益高于民间经济利益。海禁派的强硬立场，招来浙江、福建地方民间国际贸易势力的强烈反弹。在政府锁国与民间开放的较量之中，演绎了影响深远的“嘉靖大倭寇”事件。这场反民间国际贸易的战争，前后十多年，“用兵以百万计，费金钱不计其数”。在沿海地区，发生这样规模的战争，确实可以称中国“宇宙以来所无之变矣”。嘉靖以后，宁波设立了浙直总兵。浙直总兵与分巡海道的出现，正说明了宁波海防形势的严峻。倭患的本质是国际贸易道路的不畅通，倭患是大陆与海洋两种文明矛盾的结果。

隆庆（1567—1572年）以后，虽然开放了西洋贸易，但日本一直被列入贸

易制裁国之列，至明亡不变。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有人要求开放宁波口岸，但受到宁波籍阁老沈一贯（1537—1615年）的抵制。1599年，虽然恢复了浙江省舶司，但仅是国内贸易稽税机构。由此可见，双屿港的消失，使宁波失去了成为东亚国际贸易中心的机会。

## 二、洋行林立，买办辈出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按照《南京条约》规定，宁波被辟为通商口岸。英军司令璞鼎查甚至擅自宣布定海为自由贸易港，“各国船只”，“任便贸易”。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指定江北岸为外国人通商居留地。英、法、美、德、俄、日、西班牙、葡萄牙、瑞典、挪威、荷兰等国商人接踵来甬贸易，并相继设立太古、怡和、旗昌、美孚、宝隆、华润、花旗、永兴、协和、谦和、正隆、英美烟草公司、正大火柴厂、亚细亚火油公司等20多家洋行和洋商企业。同年，英、美、法等国在宁波开办邮政业务。次年，美国长老会在宁波开设美华书馆，经营印刷业。同治元年（1862年），美商旗昌轮船公司在宁波建造趸船式浮动码头，经营航运业。同治三年（1864年），英商利生银行在宁波开设支行，委托洋行代理汇划业务。同年，宁波设有5家外商保险公司。同治四年（1865年），英商汇丰银行在宁波开设办事处。同治六年（1867年），英商在宁波开办太古轮船公司。同治八年（1869年），法商永兴洋行设立宁波分行，经营草帽业务。同治十三年（1874年），英商设立宝隆旗昌洋行宁波分行，经营航运业。同年，宁波设有10家外商海事保险公司，其中英商5家，美商3家，德商2家。光绪三年（1877年），英商设立太古公司宁波分公司，该公司的北京号轮船行驶沪甬线。同年，美商在宁波开设大美烟草公司。光绪十六年（1890年），英商在宁波开设太古洋行，经营烟草、食糖、保险业务。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美商在宁波设立美孚火油公司。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英商在宁波开设亚细亚火油公司。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英美商人在宁波开设英美烟公司。宣统二年（1910年），德商在宁波设立礼和洋行、谦信洋行。同年，英商在宁波设立祥泰木行。外国商人在宁波设立洋行，经营新兴行业，特别是轮船业、银行业、保险业和日用洋货业，对宁波商民产生较大的影响。

外国人不仅在宁波设立洋行，还创办多所教会学校，一些宁波学童从小接受欧化教育。如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麦嘉缔来宁波，在佑圣观施医传教，次年创办崇信义塾。同年，英国基督教女传教士奥特绥在宁波创办女塾，后由美国长老会接办，改名崇德女校。咸丰十年（1860年），英国循道公会教士阚斐迪在宁波创办蒙馆，此为斐迪中学前身，光绪十三年（1887年）改称斐迪中学。光绪六年（1880年），美国基督教浸礼会在宁波创办养正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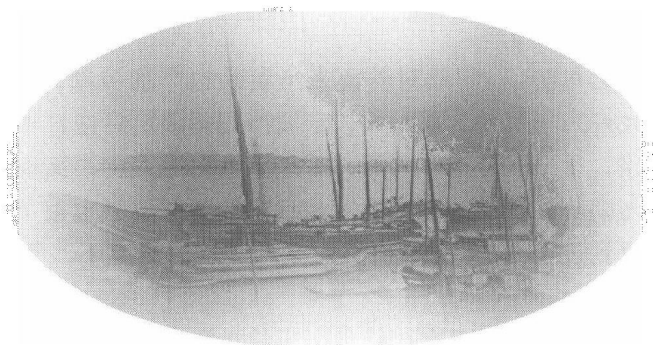
华洋杂处，不少商民在洋行任职。据1891年印行的《浙志便览·浙省总序》，当时在洋行服役的民众人数上万，分别充任“买办、大写、小写、翻译、

跑街”等职。上海人称买办为康白度，是 *comprador* 的译音。买办受雇于洋商，为洋商推销洋货，收购土货，招揽业务，刺探行情，是外商企业的华人雇员，是外商在中国的经理人，也称华经理。他们当中有些人，利用自己信用好，洋行大班买他们的账，也经营自己的生意。北洋大臣李鸿章说他们“于士农工商外，别立一业”。其实，买办即从事对外贸易的新式商人，是中外贸易的桥梁。外商企业一般都设有买办间，也称华账房。买办间除设买办（即华经理）外，为了业务需要，或便于与外国大班接洽，或照顾买办间办事人员中资历较深的人，或安插家族成员、隐名合伙人和后台老板推荐的人，往往设置副买办和跑街。买办用跑街串门兜揽生意，因而跑街也叫串门子。买办对公司负责，每做成一笔生意，由公司在收入中提成支付佣金。买办又从自己的佣金中支付跑街佣金。能干的跑街，被大班看中，也有升为买办的。

鸦片战争后，宁波商民充任买办的人很多。其中定海人穆炳元熟悉英语，又博得英国人信任，时常担任大宗交易的中间人。他常为宁波同乡向英商中介大宗生意，还广收门徒，传授经纪贸易诀窍。他是宁波籍买办中的老前辈。王槐山、邬挺生、周宗良也是颇负声望的老资格买办。宁波人充任买办者，不胜枚举。如定海人朱葆三，为英商平和洋行买办；其长子朱子奎，为日商三井银行买办；次子朱子聪，任英商上海平和洋行买办；三子朱子方，任汉口平和洋行买办，后兼任日商日清轮船公司汉口分公司买办；四子朱子衡，任上海平和洋行买办；长孙朱乃昌，任职于日商三井银行买办间。镇海人叶澄衷四子叶子衡，为日商台湾银行买办。鄞县人毛和源，先后任科发药房、老晋隆洋行、百司洋行、茂大洋行、美狄银行、先云洋行买办，华义银行副买办。镇海人王皋荪，任英商太和洋行买办。刘鸿生为英商开平矿务局买办，其父刘贤喜为轮船招商局买办，其弟刘吉生，为美商联怡公司买办。虞洽卿为鲁麟洋行、华俄道胜银行、荷兰银行买办，其子虞顺恩也是荷兰银行买办。叶星海为德商兴隆洋行、法商永兴洋行买办。镇海人傅筱庵为美商美兴洋行、友华银行、英商长利洋行买办。镇海人王蓉卿，毕业于法国礼尔大学，曾任法国和比利时商人合办的义品放款银行买办，1936年转任法商东方汇理银行买办，直至1945年以年老让位给其子王肇元。王肇元于1945年至1950年任东方汇理银行买办。定海人厉树雄曾任意商华义银行第一任买办，后又任英商会德丰公司买办。王铭槐家族更是四代买办，他自己也是德商泰来洋行、华俄道胜银行买办，其子王采丞是法商中法工商银行买办，王毓丞是德商德华银行买办；其孙王步洲、王云洲也是德华银行买办，另一孙王品南，是天津中法工商银行副买办；曾孙王义范（王品南子），是天津永丰洋行买办。

中外互相贸易，长期与外国商人贸易往来，辟为商埠，洋人在宁波设立洋行，兴办教会学校，宁波商民频频接触外来文化，不少人充当买办，熟悉洋商的经营理念、经营手腕和管理方式。这样的环境，对宁波商人经营新式商业及从旧式封建商人衍变为新式商业资本家，具有重要影响。





## 第二章

# 宁波商帮的发展历程

宁波乡民外出经商由来已久，而结成商帮，则是明末清初的事。其结帮的标志，是天启、崇祯年间（1621—1644年）宁波商人在北京设立鄞县会馆，该会馆属于同乡会馆，旨在“以敦亲睦之谊，以叙桑梓之乐，虽异地宛若同乡”。其后，宁波商帮的发展历程，大体可分为形成商帮、迅速发展、臻于鼎盛、转移海外和新时期宁波商帮五个阶段。

## 第一节 宁波商帮的形成

### 一、宁波商帮形成缘起

明清海禁，使宁波延续了几百年的繁华渐渐衰落下来。由于中外贸易的中断，大批宁波商人纷纷前往沿海与内陆各省寻找商业机会，于明末清初逐渐形成宁波商帮。具体分析，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宁波是滨海港口城市，因而古代宁波商人主要从事海外贸易。但在国内各地经商的也并非少数。据《甬上张氏宗谱》记载，宋代宁波巨商张云衢，在扬州经商发家，成为首富，人称“封君”。明万历年间，宁波商人孙春阳在苏州皋桥开设的南货铺，是苏州有数百年历史的老店。据钱泳《履园丛话》记述，这家南货铺“天下闻名”，所制物品有上贡宫廷御用的。这店规模恢宏，店房分为南北货、海货、腌腊、酱货、蜜饯、蜡烛等六房，“店规之严，选料之精，合郡无有”。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宁波、绍兴乡民“竞贾贩锥刀之利，人大半食于外”。《广志绎》成书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可见万历前宁波人外出经商者已为数不少，明末开始形成宁波商帮并非偶然。

第二，明朝政府对沿海各地厉行海禁，洪武年间曾三令五申：“敢有私下诸